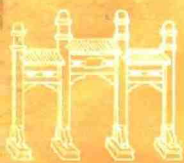


1987年



南京文史集萃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南京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会编



南京文史集萃

(一九八七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南京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一九八七年）



江苏古籍出版社

南京文史集萃

(一九八七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南京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盐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5.5 插页1 字数139,000

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ISBN 7-30319-082-5/K·57

责任编辑 杜基顺 定价: 1.85 元

目 录

爱国志士史量才及其被害始末	天语 存实 志良(1)
回忆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	贺儒雄(9)
怀念徐悲鸿先生	周侯松(38)
西安事变见闻录	韩正礼(41)
浅述国民政府时期的警察教育	冯子厚(49)
上海国民党空军中的两次工潮	张达孝(60)
忆“复成桥惨案”	韩正礼(71)
侯德榜传略	张能远(73)
两都双考记	姚亦凡(86)
任崇高同志革命生平事略	蒋向红(90)
“书虫”轶事	
——忆作家许地山勤奋读书	周侯松(112)
对南京港口历史资料的片断回忆	张德山(118)
“洋行”风暴	
——南京和记洋行中国工人反帝斗争史略	胡闹荣(141)
南京帽业沿革概述	民建南京市委 南京市工商业联合会(151)
南京侨乡华兴村	周启源(163)
对《简话百年学校明德女子中学》一文的补正	
.....	雷南鸿(170)

爱国志士史量才及其被害始末

天语 存实 志良

(一)

1934年11月13日，在沪杭国道线上杭县与海宁交界处的翁家埠大闸口附近，发生了一桩震惊中外的政治谋杀惨案。是日下午两点多钟，当一部从杭州西子湖畔“秋水山庄”开出的保险汽车到了这里时，被一部横在路心挂着“京字72号”车牌的“别克”汽车挡住了去路。突然一声哨响，“别克”车旁六、七个黑衣汉子一齐拔出枪来，连连向那部保险汽车射击。保险车里连同司机在内的六个人，当下有两人立即中弹身亡，两人受伤倒地，一位青年在雨点似的枪弹中奋力向杭州方向跑去，另一位五十四、五岁的中等身材的人（即车子的主人），沿着一条乡间小路飞奔逃命，在闸口里二十号农民沈瑞富家附近的一个干水塘里，被两个暴徒赶上枪击头部而死。这一事件发生后，当时在全国影响最大的上海《申报》首先刊登出了一条惊人的消息：本报总经理史量才先生遇害！

史量才于一个多月前偕家人到西湖边上他的“秋水山庄”别墅度假，不料在假满回沪路上，突然遭到了这场横祸。当时，除了他的儿子史咏赓侥幸逃脱以外，他的夫人沈秋水和沈的侄女沈丽娟都受了伤；同车的史咏赓的同学、杭州之江学院二年级学生邓祖询和司机黄进才，同史量才一道罹难。

消息传出，上海震动，全国注目，舆论哗然。许多报刊发表评

论,认为史先生遇害是“社会一大损失”、“舆论界之一大创伤”;认为“此次暴徒敢于沪杭国道白昼行凶,又复从容逃逸,此中必有背景原因”;进步舆论更同声愤慨,要求当局“严缉凶手,务将此案查个水落石出。”连外国人办的《泰晤士报》也在评论中指出:“就种种情势察之,此案必暗杀团镇密布置所为者”,“此种以野蛮手段所行之罪恶,实足使沪上各界人士为之震骇也!”

(二)

1880年1月2日,史量才出生于今江宁县龙都乡的杨板桥村。他原名史家修,父亲史春帆在松江泗泾镇经营一片“史泰和堂”药店,长年不在家。他在母亲的抚养下,于杨板桥村度过了童年,直到母亲去世,才被父亲带到泗泾,从塾师载葵臣读书。1899年,他在松江府娄县考中秀才,因为当地童生告他“冒籍应试”,被取消了秀才资格而成了附生。后来,他受当时维新思潮的影响,绝意科举致仕之途,于1901年考入杭州蚕学馆,毕业后,先后在上海育才学堂、兵工学堂、务本女学、南洋中学等校任教,继而于1904年在上海自己创办一所女子蚕桑学校,开了我国女子科技教育的先河。这期间,他也开始参加当时的社会活动。1905年,他参加了上海学界组织的宪政研究会;又与黄炎培等发起成立了江苏学务总会。1907年,江浙两省绅商为反对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修筑江浙铁路的丧权借款契约,发起了收回路权的运动。史量才积极参加了这一运动,被推举为江苏铁路董事。同时,他又在南京发起组织全国农务联合会,担任了总干事。1910年,南京举办“南洋劝业会”,他积极邀请一些农学家参加,也尽了很大力量。

辛亥革命的义旗举起之后,史量才参加了江苏的独立运动。南北议和会议在上海举行时,他参加了协商活动。主持江苏的程雪楼、张季直、应季中等,对他办事干练、思想敏锐非常赏识,常找他

共谋一些大事。1912年，他被委任主持沪关清理处和松江盐务局的工作，社会活动更加活跃。

1912年，史量才与张季直、应季中等从席氏弟兄（子眉、子佩）手中买进了我国最早出版的报纸之一《申报》，史任总经理。早在1908年，史量才就曾一度担任过《时报》的主笔，产生了“新闻救国”的愿望。担任《申报》总经理后，他认为是实践这一抱负的时候到了，便倾其心力，锐意改革，悉心经营，多方罗致人才，增添印刷设备，广辟国内外新闻渠道，积极改进报纸业务。经三年努力，他退还了张季直等人的股款，使《申报》由与人合营变为他独资经营。此后，他又从美国购进了新式轮转印刷机，并延聘进步文化人协助办报，使《申报》由传统经营开始走向企业化、现代化，由保守趋向进步。通过这些努力，报纸由开始的日销7000份增加到15万份，成为当时国内最有影响的大报之一。在此期间，他还创办了有名的《申报月刊》，出版了《申报地图》，编印了《申报年鉴》。1929年，他又从美商福开森手中购进当时为国内大报之一的《新闻报》的大部分股权。这样，史量才成了上海以至全国最大的报业企业家和著名的新闻事业家。

在致力新闻事业的同时，史量才以其声望与经济力量，又向金融、实业界显其身手，展其经纶。他与南洋侨商黄奕住创办了中南银行，协助项松茂扩大了五洲药房的业务，与陆运逵复兴了中华书局；自己又兴办了民生纱厂等企业，经他兴办和合股的企业，先后有十余家。在上海，他又成了实业界和金融界的有力人物。

然而，正当史量才为发展我国的新闻事业和振兴民族经济而大展雄图的时候，却因他争民主，反独裁，主张抗日，反对内战，被国民党的反动派暗杀了。

(三)

1931年以后，“九一八”事变与“一二八”事变相继发生。在民族危机的紧要关头，史量才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忧心如焚，上下求索，想在迷惘中寻找出一条救国之道。全国人民抗日救亡高潮的影响，特别是与宋庆龄、杨杏佛、陶行知等爱国进步人士的接触，使他认识到只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才是中国唯一的出路。于是，他以《申报》为阵地，大声疾呼，积极宣传抗日主张，呼吁停止内战，共御外侮。“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申报》发表“国人乎速猛醒奋起”的时评，提出了“化除内争，一致御外”的明确主张，并指责当局“因循坐视，毫不自主，其将令文明古国大好河山，今日遂覆灭于吾人之手乎！”之后，又强烈地抨击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号召“我全国民众当起而共弃之”，同时毫不含糊的指出：“唯抗日乃能救国，唯一致攘外乃能救国！”与此同时，史量才出席上海抗日救国委员会会议，被选为委员，负责国际宣传和抵制日货工作。他还与上海金融、实业界人士组织了“壬申俱乐部”，探讨反侵略、救国家的对策，向上海国民党当局直言上陈。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后，《申报》连续发表了《敬告国民》、《国家的军队》等评论，指出“我国到此，万难再忍，自不能不起而作正当的防卫”；号召全国军队“踏着十九路军的血迹，收复已失国土”。事变第三天，史量才发起组织了“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他在成立大会上慷慨陈词：“我年近花甲，但无所求，但愿生前不做亡国奴，死后不作亡国鬼。”他组织各界人士大力支援十九路军，自己也毁家纾难，为抗战尽一切能尽的力量。这期间，他每天奔走、工作，每每深夜不辍，有时胃病发作，服点止痛片仍继续坚持，工作完了，还要去和宋庆龄、杨杏佛、陶行知、黄炎培等商量抗日大计。在募集救国捐中，他首先将《申报》存在汇丰银行的七万多美元提出兑成银元。

交地方维持会供抗战军需之用。他和地方维持会募集到的捐款达33万元，有力地支援了十九路军和救济了大批难民。

1932年4月初，蒋介石政府与日本举行了上海停战会议。《申报》一再发表评论，呼吁政府维护主权，不能再作让步，但他们还是同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这种违反全国人民意志的倒行逆施，使史量才愈加清楚地认识到：要抗日救国，就必须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和独裁统治。从此，他也愈加坚定地走上了反内战、反独裁、争取民主的道路，从一个爱国志士，发展而为一个无畏的民主斗士。

在上海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为压制抗日民主力量，曾于1932年3月间要召开一次所谓“国难会议”。筹备会议的汪精卫先定下了一个会议“以讨论御侮、救灾和绥靖为范围”的调子，史量才立即与马相伯等六十六名会员联合致电国民党，拒绝参加这个会议，并于《申报》发表时评，提醒“被征聘之诸君子是否甘为傀儡，其三思”。结果，原聘会员五百多人，三分之二以上的人都没有到会。同时，《申报》陆续发表评论，公开提出了“停止一党专政”、“停止训政、实行宪政”等主张。《淞沪停战协定》签订以后，《申报》在《追悼沪战殉难将士》的时评中指出：“此战有若一声洪钟，敲破我民族二十年来酣于内战之心理。”蒋介石发动第四次“围剿”时，史量才与宋庆龄、杨杏佛、陶行知等经过长谈取得一致意见，在《申报》上连续发表了由陶行知执笔写成的《剿匪与造匪》等三篇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举国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所剿之匪，何莫非我劳苦之同胞”，并尖锐地道出了蒋介石发动内战，“剿匪其名，而剿民其实”的本质。

同时，史量才以《申报》为基本阵地，与进步、民主人士一起，发展进步文化事业，传播抗日救亡火种。经陶行知介绍，他聘请李公朴创办了“申报流通图书馆”、“申报业余补习学校”、“申报妇女补习学校”，还约请了艾思奇、柳湜、夏征农等参加了流通图书馆工

作。他聘请作家黎烈文主编《申报》副刊《自由谈》，使之成了反文化围剿的重要阵地。当时，如鲁迅、瞿秋白、茅盾、郁达夫、巴金、胡愈之等著名文学家，都为《自由谈》写稿；特别是鲁迅先生，在从1933年1月到1934年8月的短短时间里，就在《自由谈》上发表了140多篇杂文，向黑暗反动势力投去了只只匕首，给了他们以辛辣的嘲讽和有力的打击。

1932年12月，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在上海发起了反对法西斯迫害、保障人民权利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史量才积极支持“同盟”的活动。他除了派陈彬和和钱华参加“同盟”担任总会和分会的执行委员外，并冲破国民党当局新闻封禁，公开发表了“同盟”的宣言和一般报纸不敢报道的“同盟”的活动情况。同年3月，“同盟”营救在上海租界被捕的共产党人廖承志、罗登贤和余文化，《申报》立即登载了律师为三人所作的辩护声明，紧密地配合了“同盟”的行动和扩大了它的政治影响。史量才本人，通过斗争实践，进一步成长为一个勇敢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

而这一切，引起了当时国民党的反动派对史量才的仇视，必欲除之而后快。

(四)

对于史量才，蒋介石用尽了种种手法。

一是拉。当国民党当局成立“上海临时参议会”时，蒋为了拉拢史量才，曾指定他为参议会的议长；又先后授给他上海战区善后委员会副委员长、农村复兴委员会委员、中山文化教育馆常务理事、红十字会名誉会长等一大堆高级头衔。但史量才丝毫不为所动，反内战、反独裁、抗日救国、争取民主的言论和行动，更加勇敢、更加激烈了。

二是逼。1932年，蒋介石见史量才不肯就范，就亲手批令“《申

报》停止邮递”六个大字，企图以此逼迫史量才让步。但史量才仍然不买账，他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时即席发言，公开表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同盟”的立场，同时对禁止《申报》邮递事件表示严正的抗议，他毫不含糊地指出：“未经任何法律手续，就采用此等卑劣手段限制报纸在外地的发行，对于这种侵犯出版自由的行为，决不能加以容忍！”

三是吓。1933年6月，蒋介石命令戴笠暗杀了杨杏佛。并暗示史量才如不收敛，也将落不到好下场。史量才对此仍给它个不睬不理。据说，由于杜月笙的斡旋，蒋介石曾把史量才召到南京，甘言加笼络，后见史不睬他那一套，便沉下脸来恫吓说：“我手下有几百万军队，激怒了他们，是不好办的！”史量才针锋相对，立即回敬说：“我们《申报》有几十万读者，我也不敢得罪他们！”

拉、逼、吓不成，蒋介石终于采取了最后手段：杀！他密令戴笠务必将史暗杀掉，戴笠受命后，选择了史量才到西湖度假的时机，派军统局行动组长赵理君、副组长王克全赶到杭州策划。赵、王在沪杭国道上布下了黑网，并从南京调去一部“别克”汽车，由浙江警官学校特训班的教官金民杰立即伪造一块“京字72号”的汽车牌照，冒充南京盐业银行的车子，由后来干上军统局汽车大队长的张秉午装载着军统老牌刽子手李阿大、施芸飞、许建业等特务，赶到暗杀地点。于是，在1934年11月13日下午，便发生了那一幕骇人听闻的政治谋杀惨剧。事后，特务们从容逃逸，受蒋介石密令配合暗杀行动的浙江警察局长赵龙文给戴笠发去了一份电报：“一部二十四史，已在杭州购得。”就是说，暗杀史量才的计划，已经实现了。

史量才被暗杀的消息一传出，中外舆论哗然。国民党政府当局为掩人耳目，假惺惺地悬赏公告，通缉凶手，但凶手们却在得意洋洋，庆功领赏，连参与此案的赵龙文也跟孔祥熙出使英国，参加乔治六世的加冕典礼去了。

(五)

对史量才之死，全国爱国进步人士无不悲愤痛惜，史量才的家乡人民，更是悲痛怀念不已。因为，史量才虽然早已离开故里，但他对家乡人民，始终怀着深厚的感情。1921年他父亲史春帆在泗泾镇逝世后，他和家人亲自送回灵柩，安葬于龙都乡余家渡附近的秦淮河畔，并立碑刻文，以志永念（此碑现仍存龙都）。他妹妹史家瑞不愿到上海，仍居家乡，他按月寄给八十元生活费。对异母的哥哥史家禎，他在泗泾为之买田造楼，并将家禎的儿子史必忠安排在中南银行当会计，1921年史量才回乡时，见家乡人民缺吃少穿，他便在回沪后汇款来购买稻谷，救济乡亲，共赈放了三百五十多石稻子。1931年发生水灾，中圩破圩，史量才又出资给家乡修圩建堤，并派人送一百多棵杉木供修圩之用。为使家乡儿童能受到教育，他出资在杨板桥办了一个学校，在湖熟等地聘请一批德才兼备的老师任教，教师的工资全由他从上海汇来。此外，史量才还与刘伯森、陶晋保、唐云阶等组织起南汤山兴业公司，为家乡发展经济尽力。他还计划在东山镇为江宁县建立一所规模较大的医院，不料方欲着手，他即遭了暗杀。

岁月流逝，半个世纪过去了。龙都的乡亲怀念着史量才先生，全国人民对这位杰出的爱国志士也永志不忘！

回忆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

贺 儒 雄

一、抗战后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的恢复与重建

1928年11月，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委会通过决议，在首都南京紫金山南麓的孙中山先生陵园附近，创办一所革命烈士子弟学校，专门收容北伐大革命中阵亡将士的子女和辛亥革命中壮烈牺牲的先烈后代，由国家培养教育。学校定名为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中常委决定学校由孙中山先生夫人宋庆龄、蒋介石、蔡元培、胡汉民、戴传贤、何应钦、廖仲恺先生夫人何香凝、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和何应钦夫人王文湘等组成建校筹备委员会，并任命宋庆龄为校长。

学校的校址，设在中山陵园范围内，占地130余万平方米。学校的选址是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当年孙中山先生领导了民主主义革命，跟随孙先生并继承其遗志，在历次战争中英勇献出生命的烈士，其遗孤安排在国父孙中山先生安眠之地的附近生活和学习，象征着烈士后代仍在享受着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先生的关怀。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敌陷南京，遗族学校被迫解散，学生流亡各地，教职员工各奔前程。

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后，遗族学校的校舍设施，据说曾被当成日伪的伤兵医院。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国民政府由重庆还都南京后，乃决定重建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由国家筹集资金，

将原校舍修缮一新，校园花草树木和各项教学生活设施，均整修完备，并于1947年秋，开始接纳从全国各地送来的学生，其中，增加了很多抗日战争中阵亡将士的子弟。

学校的农场和牛奶房先期恢复，校农场由原校的老同学汤鹤松先生负责；牛奶房由老同学王育民主持工作。汤、王等老同学，在抗日战争期间，经历千辛万苦，迭次转移学校的部分珍贵教具和数十头奶牛，保护了学校的财产。日本投降后，他们从成都返回南京，为战后学校的恢复，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重建后的遗族学校，只在校本部恢复了男校，宋庆龄不再担任校长。据说：宋庆龄担任校长时期，1932年6月3日在宋美龄陪同下，第一次到校与全体师生亲切会见，不久她又前往德国参加国际反帝同盟大会。出国期间，由宋美龄代理校长职位。蒋介石很想占据校长这个职位，曾于1931年1月实行男女分校时，女校校长由宋庆龄担任，而男校实际上则被蒋介石的励志社派系和基督教会的势力所控制。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了牢牢控制遗族学校，任用励志社副总干事黎离尘担任校务主任，领导和处理学校的日常工作。

黎离尘年纪大约已近六十岁，个子不高，脸上有着不十分明显的麻子，微微驼背，经常穿着一身旧的黄绿色军便服。他在上司面前，毕恭毕敬，在下属眼里，也算是一位和蔼的人。他举止彬彬有礼，平时说话有些颤抖的毛病，当在蒋夫人面前，因为拘谨，就更抖得厉害，听口音，他象是浙江一带的人。平时他讲普通话，当和宋美龄谈话时，便用宋美龄惯用的方言交谈。学校每逢星期一早上，都要举行纪念孙中山先生的周会，他在会上对师生发表讲话，声音低沉、缓慢而有力。黎先生的家住在南京夫子庙一带，每天早晨乘一辆牌号为00—843号的黑色轿车到校。

他在很短的时间里，把学校管理得井井有条，很受宋美龄的赏识。的确，黎先生不论是从社会活动能力上看，或是从能“通天”的

影响上看，担任校务主任一职是很恰当的。这和他本人有一定的工作魄力有关系，更重要的是他对蒋氏夫妇的忠心。

学校校务处下设训育处、教导处、总务处等机构。

训育处负责督促执行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作息制度。开学之初，向学生灌输公民课程教育，宣讲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总理遗嘱和蒋介石制定的青年守则十二条。平日，几乎天天教学生唱国歌和国旗歌，并负责举行每日的升旗和降旗仪式，贯彻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天下为公”、“礼义廉耻”以及蒋介石提倡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说教。

训育处主任姓吴，是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年人，个子高大，很少对学生发火，显得是一位慈祥长者。但他手下较年轻的训育处职员，可都锋芒毕露，傲气十足，管起学生来好像是穿军服的宪兵。特别是有个姓仇的职员，相当粗暴，引起学生的不满。一些年少体弱的学生，对训育处的职员更为反感。

教导处主任姓严，架子很大，对学生很少有笑脸，学生对他敬而远之。教导处有八位职员，对学校课程的教育抓得很紧，对学生要求也很严格。学生的各种教学设施和个人学习用品，都由教导处列出计划，由总务处承办，免费发给师生。

总务处处长和学生接触不多，在学生的眼里，他是一位难得出头露面的人。总务处管辖范围很大，包括学生的衣、食、住、行，校舍的日常维护，清洁卫生，花果树木，道路和各种设施的维修等。总务处制定有各种完善的规章制度，全校各个角落都有人管理，使学生吃得好，休息得好，处处整齐清洁，学生对此很满意，外界人士到校访问参观，也都点头赞扬。

除了以上这几个主要机构外，还有童子军团部。团部有团长和三名担任童子军课程的教师。他们在学校算是最清闲的。童子军理论课本最没意思，学生不愿上这门课还不行。童子军课也有室外活动，有些很象少年俱乐部的活动，颇能吸引这些常年得不到

家庭温暖的学生。

学生入学审批很严格。在审批程序上，抗日战争前就很严，烈士子女首先要填写“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学生申请入校表”，送交学校筹备处审查，然后将基本符合条件的表格汇总呈送蒋介石批准，只有蒋介石亲批“可”的，才能报到入学。据说当蒋介石不在南京时，授权何应钦批办，何也是极为慎重，从不轻易批“可”，宁可等蒋介石返回时再批。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是校长，掌握更严，待1947年9月1日开学时，因学生太少不能开课，开学的日子只得后延。

二、我进入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

日本投降以后，我全家于1946年8月乘轮船从重庆回到离别八年的南京故乡。我家住的洪武路“友庐”，经历了八年灾难，一片荒凉。“七七”事变后，父亲（贺崇悌，黄埔军校第二期学生，曾任湖南源陵城防司令官，1938年8月11日弹伤复发逝世）带着全家离开故乡，万没想到胜利归来，先父的白骨已留在他乡。当年没有能逃离家乡的伯父，也惨死在日军的军刀之下，尸骨无踪，可说是家破人亡。

回到南京的家，母亲把先父的一大幅身着军装的半身遗像，挂在堂屋西边墙上，让全家经常怀念他。先父生前的亲朋好友，听说我们历尽苦难回来，纷纷前来看望，往事的悲，重逢的喜，交织在一起，真是感慨万千。

1947年秋的一天，长江天险江阴要塞司令陈刚将军陪同国防部副官处副处长冯宗毅将军等黄埔军校老朋友来到我家，闲谈中问及我们兄弟姊妹六人的学习情况，其中一位将军把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即将恢复的消息告诉了我们，同时，商量如何帮助我进入这所学校。这所学校，虽是国民军先烈的子弟学校，但毕竟先烈

多，遗孤更多，不是都可以进得去的，要先设法“通天”才行。

家住原廖家巷三号的鲁崇敬将军，是先父黄埔二期的同期好友，两家相距仅数十步，对家父最为了解。黄埔四期的姜吟冰伯伯，北伐战场上与家父同时身受重伤，同在南昌的一所法国人办的医院里治伤，姜夫人甫灿云女士，又是和家母同学。两家人有深厚的友谊。家父去世后，黄埔的同学还经常提起先父在北伐战争中的一段戏剧性故事：

那是1928年，先父在浙江嘉兴担任某师某团第三营营长，一次担任值星官，而第一营营长萧乾，由于是陈诚派系的人，故意不听从值星官的调遣，当场和先父发生冲突，先父一气之下，把值星官的佩带从肩上取下，扔在地上不干啦！萧乾在陈诚面前告了家父一状，陈诚又跑到蒋介石面前告状，蒋介石听后，不分青红皂白，对此案批了“永不录用”四个字，先父因之失去官职。之后，先父经常到南京黄埔军校同学会去，和黄埔的同僚谈天，叙说委屈。大家都愤愤不平，要求向蒋介石当面申诉。

一天先父在同学会谈笑，突然发现蒋介石进来，立即按军规喊“立正”口令，向蒋致敬礼，并把在嘉兴任营长时的事情真相当面向蒋介石报告，蒋听后，用相当和解的语调说：“好啦！不要再吵啦，贺崇德就先留在我身边担任副官吧。”一场风波，就此平息。黄埔军官们对蒋介石这一戏剧性的处理办法很感满意。先父遂担任了蒋介石随从副官，数月后被调到上海任“上海市国民军训委员会主任委员”一职。

事过不久，于右任先生特以此事亲手书写一副对联赠给家父：

磊落见异人，
慷慨气长城。

于是一位爱国的老前辈，是我们很尊敬的革命老人。他在对联中写“友渔兄惠存”（家父字友渔），落款“于右任赠”，这充分说明